

# 华北沦陷区教育概述

王士花

---

---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北沦陷区实施军事、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的同时,极力推行奴化教育政策。日伪控制华北后,以新民主主义取代三民主义,推行封建复古教育,改变学校课程设置,修改教科书,强行普及日语教育。华北沦陷区名目繁多的日语学校的出现,成为华北教育界的一种畸形现象。日伪用各种方式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控制,也是华北沦陷区教育的特色之一。但任何宣传和说教都无法改变活生生的现实,华北沦陷区的学生大都保有“五四”青年的爱国精神和抗日思想。

**关键词** 华北沦陷区 教育 教科书 日语教育 思想控制

---

---

日本全面侵华时期,为使沦陷区人民服从其殖民统治,在进行军事、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的同时,推行奴化教育政策。学术界对日本在伪满及华中沦陷区推行的殖民地教育状况已有不少研究,但关于华北沦陷区的教育,还刚刚起步。<sup>①</sup> 日本学界从语言政策的角

---

① 主要有:孙新兴《日本在青岛的殖民奴化教育评析》,钟春翔《抗战时期的山东日伪教育》,均刊于《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另外,齐红深主编《日本侵华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版)、赵承福主编《山东教育通史(近现代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余子侠著《民族危机下的教育应对》(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也在有关章节中,对华北沦陷区教育有所涉猎或提及。

度对日本侵华时期强制推行的日语教育政策, 作了不少研究<sup>①</sup>, 但对沦陷区日语教育的实际状况, 尚未厘清, 也缺乏与日本在沦陷区所推行政策的总体联系研究。

日本在华北沦陷区推行的是怎样的奴化教育政策? 具体方针、制度、实施状况如何? 有什么特点? 本文拟从华北沦陷区教育政策与体制、日语教育、对学生思想控制这三个方面, 对其作一初步探讨, 以补充以往相关研究的不足。

—

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 开始全面入侵中国后, 很快着手拉拢汉奸出面维持地方治安与社会秩序等。7月30日, 日军即在北平组成北京市治安维持会, 以负责地方“治安”。北京市治安维持会的文化组具体负责教育事宜。为使教育适应日本统治需要, 当即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设立国省立学校保管委员会; 公布大学管理规定; 设置国立文化机关保管委员会; 设置临时教科书审定委员会; 举办教员再教育讲习会; 改变教授科目; 普及日语。<sup>②</sup> 其实, 所谓“国省立学校保管委员会”、“国立文化机关保管委员会”, 也不过徒有虚名, 连著名的清华大学都被日军占用为部队医院, 其“保管”能力也就可想而知了。其主要工作就是改变教授课目、修改教

① 主要有: [日] 驹 武《中日战争时期文部省与兴亚院的日语政策构想》,《东京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29卷, 1989年。[日] 驹 武《战前中国大陆的日语教育》,《讲座·日语与日语教育》第16卷, 明治书院1990年版。[日] 石刚《殖民地统治与日语》, 三元社1993年1月版。[日] 徐敏民《战前中国的日语教育——关于在台湾·满洲·大陆的展开与变化的比较考察》, エムテイ出版1996年1月版。

② [日] 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华北文教现状》(1941年7月)。转引自(日) 佐藤尚子《汪兆铭傀儡政权下的教育》,《大分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纪要》16, 1994年版, 第391页。

科书。例如废除公民课, 改设修身课, 以孝经、四书五经等封建文化取代受美国社会教育影响的公民教育; 设日语为必修课, 改英语为选修课。<sup>①</sup>

日军扶植汉奸组成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 通过向伪临时政府派遣中央顾问及辅佐官来控制伪临时政府政务的实际运作。除 1 名最高顾问“协助”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长外, 华北伪政权的各个部等机关都配有中央顾问, 以使伪政权的一切都处于日本的控制之下。<sup>②</sup> 在日本顾问“内部指导”下的伪华北临时政府的行政委员会下设教育部, 分管教育文化事务。汤尔和任教育部总长。1940 年 3 月, 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后, 随着伪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 其下属的教育部也改为教育总署, 总长改称督办。汤尔和死后, 周作人继任督办。

自近代以来, 日本觊觎中国富源, 介入并与列强争夺在华利益, 进而公然出兵中国, 以武力攫取在华权益。却视中国人民本能的自卫性反抗为“排日”、“侮日”。因此, 日军控制下的伪临时政府即以修改南京国民政府于 1928 年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的所谓“排日”政策为己任, 在日军的刺刀威逼下, 倡言“反共亲日”。教科书是教育方针的重要载体, 是实施教育政策的主要工具, 因此日伪特别重视。1938 年 1 月 1 日, 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伊始, 即急于改变原国民政府教科书, 在京津地方治安维持会下组成教科书编纂机关: 初等教育研究会与中等教育研究会, 编纂小学、中学及师范学校同年春季用教科书, 2-3 月间,

① [日]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华北文教现状》(1941 年 7 月)。

② [日]陆军省军务课《临时政府顾问及辅佐官职务权限之件》(昭和 14 年 8 月 22 日),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

编纂印刷完毕，经审查后发给各学校使用。<sup>①</sup>

1938年3月1日，伪华北临时政府以汤尔和为委员长，组成伪教育部直辖的“教科书编审会”，由汪怡、周作人、鲍鉴清等26人组成。曾参与冀东日伪政权教科书编纂的陈远民、日本文部省图书编纂官藤本万治、日本文部省督学官横山俊平等具体负责领导编纂事宜，以清除“排日”、三民主义等内容、“日满华亲善”、“复兴”中国固有道德及儒教、鼓吹实学等为“编纂”根本方针。4月5日，伪临时政府颁布《教育部训令》，明确规定教育方针为：彻底取缔党化排日教育；实践职业教育；禁止男女共学；奖励体育；组织学校少年团；采用新定教科书；对中小学职员再教育；刷新女子教育；指导监督外国各学校等。<sup>②</sup>同年8月，编完小学、中学及师范学校所有教科书共155种，于9月新学期开始前发放到华北沦陷区各学校。<sup>③</sup>旧课本被禁止使用。新编的教科书主要有：

一、初级小学(4年制)：修身、国语、常识、算术

二、高级小学(2年制)：修身、国语、历史、地理、理科(自然)、算术

三、中学及师范学校：修身、国语、历史、地理、自然(物理、化学、动植物、生理、卫生)、算术、几何、代数

新编教科书的特色是在“复兴中国固有文化”名义下推行封建复古主义。比如，小学低年级课本讲《孝经》、《论语》，小学高年级讲《孟子》，中学课本讲《诗经》、《大学》、《中庸》、《礼记》、《左传》等，伪华北临时政府借口清除所谓“排日”内容，以所谓新民主主义取代

① [日]《华北及满洲视察报告书转呈之件》，《各国教育制度及状况关系杂件中国之部》第3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② [日]东亚同文会《第七回 新支那年鉴》，昭和17年3月，第795—796页。

③ 同上。

三民主义,禁止近代国民教育,企图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自我认同。凡有中国国旗标记的读物,有三民主义内容的书籍都列为禁书。

日伪所谓的新民主义,取自《大学》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亲民”即“新民”之意。<sup>①</sup> 提倡无自私自利之心、互爱互助、共存共荣之新民道德。这实际上是让沦陷区学生置自己国家民族的利益及正当防卫权力于度外,放弃反抗,甘心服从日本的统治。伪北京特别市立宣内东铁匠胡同简易小学校校长颇能体会日伪的教育方针,在其制定的《遵行训育方针实施方案八条》中,即明言“依照做新民之宗旨使学生养成服从自重百折不挠之精神”。<sup>②</sup>

为推行新民主义之教育方针,伪临时政府教育部令自1938年秋季学期开始,各中小学增加修身教学时数计中学每周增1小时,小学每周增1节;各中学酌添经学讲读;各中小学分别开反共救国演说讨论会、竞赛大会、作品展览会,刊发反共救国临时联合周刊,登载反共救国论文,分赠各机关及学校阅览。<sup>③</sup>

1939年1月,“教科书编审会”更名为“修正教育部直辖编审会”,执掌初、中等教育、通俗教育及印刷品的审查。<sup>④</sup>

为在沦陷区实际统治之便利,也为强制推行日本文化及思想,实现所谓“中日满亲善”,“日华提携”等,伪临时政府把日语作为正

① 《北京特别市公署教育局施政纲要计划(1938年9月)》,北京市档案馆藏, J4-1-444。

② 《北京市立宣内东铁匠胡同简易小学关于辞、聘校长及教员给北京特市教育局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 J4-3-199。

③ 《北京市公署施政纲要工作报告书(1938年10月)》,北京市档案馆藏, J4-1-444。

④ 同前,《华北及满洲视察报告书转呈之件》。

科,规定小学3、4年级每周须上2个小时的日语课,小学5、6年级每周3个小时、中学每周3个小时、师范每周4个小时、专门学校及大学每周4个小时以上。<sup>①</sup>由此华北沦陷区各地出现了许多日语学校,成了沦陷区教育的一大特色。关于此,将在本文第二部分专述。

除修改教科书、更改课程设置外,为保证其教育方针的贯彻实施,日伪还对教师进行各种名目的培训。早在1938年1月,北京特别市即遵伪临时政府教育部令,利用寒假举办北京市立公私立中小学教职员讲演班,要求所有北京市公私立中小学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及全体教员均须按时出席听讲,“以期于最短期间予各教师以教学上遵循之正规”。<sup>②</sup>

日伪在华北沦陷区推行的教育是以日本对华北的军事占领为前提和保障的,因此,其教育施策便以协助日军的军事行动为中心。让学生去慰问日军是常事。日伪在1941年至1942年在华北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为巩固其成果,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制定的《三十二年度华北教育施策要纲》即规定,协力食粮增产运动,实施集团训练,肃正思想,革新生活,提倡体育及正当娱乐。<sup>③</sup>华北沦陷区各学校已不是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专门机构。

在华北沦陷区,从城市到乡村的中小学,就处于伪临时政府的上述奴化教育政策控制下。由于日本入侵和战乱,许多教师和学生南下抗日或逃难他乡,复课的学校有限。即使如青岛这样的大城市,到1938年10月底,恢复开课的中小学,与事变前相比,仅占

① [日]东亚同文会《第七回 新支那年鉴》,昭和17年3月,第797页。

② 《教育部主办北京市公私立中小学教职员讲演班办法大纲》,北京市档案馆藏, J4-3-177。

③ 《北京特别市教育局转发华北政务委员会关于准中国青少年团校成立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 J4-3-304。

44%，教师数量占 42%，学生数量只有事变前的 35%。<sup>①</sup> 沦陷区乡村的学校恢复状况便可想而知。由于旧中国贫穷落后，近代以来不断受到外敌入侵，经济发展极为缓慢，教育相当落后。特别是农村，青少年受教育程度极低。日本的入侵更加剧了这一状况。因此，华北沦陷区的乡村，许多地方只有 1—2 年的短期小学或简易小学。

日伪对高等教育也很重视。众所周知，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山东大学等名校迁往内地。1938 年 5 月，日伪纠集汉奸文人重开“国立北京大学”，由钱稻孙任校长。开始时设有农学院、医学院、工学院、理学院，后又增设文学院、法学院，修业年限为 4 年。聘任日籍教授。另外，1938 年 4 月，又开设“国立北京师范学院”与“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院”，前者校长为王谟，后者校长为张恺。两校都分文科、理科两系。抗战前华北师范教育是男女共学，在伪临时政府封建复古教育政策统治下，“国立北京师范学院”只招男生。两校都是 4 年制。<sup>②</sup> 除上述外，华北沦陷区的高校，还有北平的私立中国学院、辅仁大学，天津的私立天津工商学院。这三所高校都是在日本入侵前即成立的。私立中国学院院长是何其巩，分文学、理学、法学三院，是 4 年制大学。据说留日学者较多。辅仁大学是教会学校，校长是陈垣，由文学、理学、教育三院组成。另外还有一些 3 年或 4 年制的专科学校。

华北伪政权当局有意与华中伪组织“合作”创办南北统一的学制，一直未得日本同意。因此，华北沦陷区的学制基本仍沿用七七事变前的制度。分初等、中等、大学、研究院四级。初等教育即小

① [日]《青岛中方教育概况报告之件》，《各国教育制度及状况关系杂件 中国之部》第一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② [日]《最新支那要览》，东亚研究会，昭和 18 年 5 月版，第 81—82 页。

学教育,又分为完全小学(初级4年、高级2年)、初级小学(4年);中等教育即中学,又分为初级中学(3年)、高级中学(3年)、师范及职业学校(3年);大学教育一般为4年(医学6年);研究院为2年。

## 二

前已述及,伪华北临时政府的教育方针明确规定普及日语教育。强制推行日语教育是日本推行其殖民统治政策的必然。在台湾如此,在伪满同样,在华北也不例外。

其实在日军扶植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后,即开始在冀东22县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命令中学必须设日语科目。到1938年底,冀东已有12所学校开设日语课。<sup>①</sup>这是日本在华北强制推行日语教育之始。

1937年日军大举入侵华北,即通过临时拼凑起来的伪组织,在占领区学校强行设日语为必修课,而改英语为选修课,且规定从小学即学日语。

1939年6月,日本“对华中央机关”——兴亚院制订《普及日语方策要领》,详细规定了在中国占领区普及日语教育的根本方针、要领、组织与事业等。<sup>②</sup>把通过日语教育把握“兴亚”精髓作为“在政治、经济、文化所有领域完成兴亚大业”的“先决的”、“紧急的”、“恒久的”、“必需的”的事业。“兴亚工作的根本”在于以“皇道

① [日]石刚:《殖民地统治与日语——台湾、满洲国、大陆占领区的语言政策》,三元社1993年版,第97页。

② [日]兴亚院文化部第三课:《普及日语方策要领(草案)》(昭和14年6月),转引自驹入武《日中战争时期文部省与兴亚院的日语教育政策构想》,《东京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29卷,1989年版,第182页。

精神”为“核心的”教育，“内可培养能指导大陆民族的纯正的日本人，外可教育青少年、教化一般民众生活”，“其武器就是日语”。可见日本在沦陷区推行的日语教育政策，绝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政策，而是溶入了其称霸亚洲的政治企图和构想。

《普及日语方策要领》规定，兴亚院内设普及日语对策本部，主要从事有关普及日语的研究、调查、计划、指导、调整、宣传、实际状况调查等。其中包括培养、指导、监督、招聘、推荐与任免日语教师；编纂、发行日语教科书及其他所需刊物；调查、研究日语教法等问题以及与兴亚院、占领区当地、文部省、各团体等的联络事项。还规定设在北平、上海、张家口、厦门各地的兴亚院各联络部内，设日语普及部，负责对从日本派来的日语教师进行实地训练和再教育、培养民间日语教员，并负责日语普及状况调查、指导监督各学校的日语教育，对沦陷区当地各团体进行协作、指导、援助，指导调整以一般民众、青少年为对象的新闻、杂志，呈报与普及日语有关的所有意见。

这样，华北沦陷区的日语教育通过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完全处于兴亚院的领导之下。北平、天津、青岛、济南等大城市学校的日语教师，有不少是兴亚院从日本招聘、并进行特殊训练后派来的。这种特殊训练更注重精神方面的内容。例如在兴亚院领导下，1941年8月25日，作为日本文部省与兴亚院的共管团体——日语教育振兴会，举办第七、八、九次派往中国教员训练班时，其实施要领即规定：磨练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所需要的情热、气魄、见识、体力，培养领导性人物的资质；培养“兴亚”教育专家的实践能力。<sup>①</sup>即，注重向日语教师灌输日本的“国策”。因此，日本派到中国沦陷区的日语教师还兼有指导中方学校的督学官的身份。当时

① 同前石刚书，第107页。

参与沦陷区日语教育的大出正笃这样描写派来的日语教员,新来的多数教员认为“自己不单纯是日语教师,而是负有代表日本民族指导大陆民族的重任,不专心于日语教室,而是奔波于政治及事务方面的工作”。<sup>①</sup>

除从日本招聘外,华北伪组织也在当地培养日语教师。有教育总署直辖的和各省、特别市举办的两种教育设施。教育总署直辖的有“国立北京师范学院”文科日文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院”日本文学系。自1938年4月设立后即开始招生,主要培养中学日语教师。各省、特别市的有山东省立日语专科学校、河北省立唐山日语教员养成所及天津特别市、山西省、河南省的省、特别市立师范学校附设日语专修班。北平因是华北伪组织首府所在地,从日本派来的日语教师、留日归国者等懂日语的人较多,又有华北伪教育总署直辖的培养日语教师的机构,所以学校都配有日语教师,而没有市属的专门培养日语教师的设施。苏北地区也没有专门培养日语教师的机构。<sup>②</sup>

山东省立日语专科学校,是1938年2月1日,日军宣抚班为向一般民众普及日语以便进行“宣抚”工作而设立的。3个月1期。同年10月移归伪山东省公署,改设专科班(2年)、速成班(1年)、特别班(3个月)。随其需求的扩大,又于1940年9月进行改组,设高级师范部、初级师范部、商科实务部,学习年限全部为3年。高级师范部培养中学日语教师,初级师范部培养小学日语教

① [日]大出正笃:《大陆日语教授概况》,《日本语》第1卷第3号,1941年6月,第25页。

② [日]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华北日语教师培养状况及天津、济南、徐州、开封各地学校日语教法调查》,兴亚院·大东亚省《调查月报》第16卷(兴亚院)(昭和16年6月),龙溪书舍1987年复刻版,第308页。

师,商科实务部招收从商人员。另外还设有6个月的留日预备班。<sup>①</sup>山东省立日语学校的不断改组,也反映了日军随其占领区的不断扩大和侵略的深入,而不断推广日语教育、加强殖民统治的现实。其他各省、特别市的师范学校附设的日语专修班,学习期限为1年。

为使日语教育符合其殖民统治需要,兴亚院华北联络部还举办日语教育讲习会。由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及各省、特别市分别实施。根据1941年1月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的调查,1940年兴亚院华北联络部从各省、特别市及苏北地区分别召集数名日本人日语教师到北平,举办了日语教育讲习会;并计划1941年2月21日至27日再从其辖区各地召集45名日本人日语教师骨干在北平兴亚高级中学举行日语教育讲习会,另外华北沦陷区各省、特别市(河北省除外)于1940年也分别召集自己辖区内的中国人日语教师,举办了约40天的日语教育讲习会。河北省的冀南、保定道地区曾召集本地的中国日语教师举办过为期1年的日语教育讲习会。

华北伪临时政府规定日语为中小学的必修课,并规定了课时和教材,每周日语课时分别是:小学三、四年级60分钟;五、六年级90分钟;中学3小时;师范2小时。但实际各地并不统一,例如河北的涿县从小学4年级开始设日语课,每周上3个小时;当时属河北省的良乡县从小学3年级设日语课,每周也是3小时;而同属宛平县的小学虽都从小学3年级开日语课,但每周上课时数却不同:长辛店镇立小学与县立卢沟桥小学是2小时,丰台镇立小学是3小时。<sup>②</sup>各学校使用的日语教材也不一样。

① 同前,兴亚院·大东亚省《调查月报》第16卷,第320—321页。

② 〔日〕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华北日语普及状况(之一)》,兴亚院·大东亚省《调查月报》第6卷(昭和15年8月),龙溪书舍1987年复刻版,第275—283页。

伪临时政府指定的是其教育部编审会编的《小学日本語读本》，而在各地学校使用的教材则多种多样。仅在河北省保定道地区就多达19种。其中除《小学日本語读本》外，还有《正则日本語读本》、《速成日语读本》、日军宣抚班本部编的《日本語会话读本》、伪南满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编的《初等日本語读本》、《标准日本語读本》、《日语会话宝典》、《初级日文模范教科书》、《初等日语读本》（天津城文信书局发行）、《高等日本語读本》（饭河道雄著，奉天东方印书馆发行）、《中等日本語读本》（饭河道雄著）、《新体日本語读本》、《青训日本語读本》、《模范日语读本》、《新撰日本語读本》（大阪屋号书店发行）、《实效速成日本語读本》、《简易日语读本》（饭河道雄著）、《实用日语会话读本》、《初级日语读本》等等。<sup>①</sup>冀东道地区使用《小学日本語读本》的小学有25所，而使用《正则日本語读本》的小学达92所之多。<sup>②</sup>这种教科书使用方面的混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伪临时政府统治力的薄弱。

日伪除在普通的大、中、小学校及师范学校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外，沦陷区的日本居留民、利欲熏心的汉奸及新民会等各种日伪机构还设立了多种日语学校，或面向成人推广日语，或是面向中小学生的补习班。根据兴亚院文化部1939年6月的调查，北平有日语学校57所，天津市内有24所，济南市内有16所。<sup>③</sup>华北沦陷区大城市众多日语学校的出现，是日本全面入侵统治华北后，教育界出现的一种畸形现象。现把北平日语学校列表<sup>④</sup>如下，从中可窥

① 同前，兴亚院·大东亚省：《调查月报》第6卷，第219—220页。

② 〔日〕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华北日语普及状况（之二）》，兴亚院·大东亚省《调查月报》第10卷（昭和15年12月），第380页。

③ 〔日〕兴亚院文化部：《华北日语教育状况》，兴亚院·大东亚省《调查月报》第1卷（昭和15年1—2月），第197—210页。

④ 同前，兴亚院·大东亚省《调查月报》第1卷，第197—202页。

见日伪在华北沦陷区实施日语教育之一斑。

学校名	校长名	地址	学习期限	设立时间
北京同学会日语学校	野朔次郎	东单三条胡同4号	3个月	1923年9月1日
佐藤日语研究所	佐藤	崇内大街75号	5个月	1938年9月18日
北京东光日语学校	松泽圣	外交部街2号旁门	4个月	1937年12月15日
明华日语学校	东园国雄	新平路37号	4个月	1938年3月26日
国术馆附设日语传习所	吴彦清	西斜街5号	3个月	1937年11月
高等日语专修学塾	金本弥	兴隆大院5号	3个月	1938年2月27日
新华日语学校	宋毅仁	西单北大街132号	3个月 4个月 6个月	1937年10月1日
北京外国语学校	鹤殿镰	西斜街甲55号	5个月	1937年12月25日
新亚补习学校	孙汉沧	西斜街65号	6个月	1938年2月17日
久松日文学校	久松米子	绒线胡同158号	9个月	1935年12月15日
新光学校	许宇山	李阁老胡同23号	6个月	1938年4月11日
业余日语学校	万子青	学院胡同51号	3个月	1938年4月25日
新民日语学校	柳泽章	中千章胡同8号	5个月	1937年12月21日
新中日语学校	李泽新	油房胡同10号	3个月(初) 6个月(中) 1个月(高)	1938年5月8日
光华日语学校	本间德治	南清浩16号	3个月(初) 6个月(中高、研)	1938年3月23日

大同日语学院	安仁山	报子街 81 号	3 个月(初) 6 个月(中) 9 个月(高)	1937 年 11 月 10 日
新民报附设新民社日语学校	武田南阳	石附马大街 21 号	4 个月(初) 6 个月(中) 8 个月(高)	1937 年 11 月
电光日语学校	中岛成子	二龙路甲 1 号	3 个月	1938 年 3 月 25 日
东方日语学校	赵效圃	安内大头条胡同乙 22 号	6 个月(初、高)10 个月(幼童)3 个月(速成)	1937 年 8 月 19 日
实用日语学校	赵海泉	崔府夹道 2 号	3 个月	1932 年 4 月 1 日
华明补习日语学校	李绍可	交道口东大街 71 号	3 个月	1937 年 11 月 25 日
益义小学附设日语班	张岐山	新太仓 43 号	3 个月	1938 年 3 月 5 日
三三补习学校附设日语班	贾林懋	东四北大街 245 号	3 个月	1938 年 1 月 13 日
于氏英文学校附设日语班	于毅	东四北大街 299 号	3 个月	1938 年 2 月 6 日
志成学院	吴寿康	北帽胡同 1 号	6 个月	1934 年 2 月
东洋学院	西田方山	后帽胡同 11 号	6 个月(初) 1 年(高) 2 年(特)	1937 年 11 月
日语家塾	刘遂尘	北沟沿 211 号	不定	1937 年 9 月
自修日语学校	赵夔	乐群巷 6 号	3 个月	1937 年 12 月
时习日语学校	杨泽民	集雅士四号	3 个月	1938 年 5 月

新冀日语专门学校	西乡晏	旧鼓楼大街 55 号	4 个月	1938 年 3 月 10 日
今川日语学校	今川势次	北锣鼓巷 78 号	6 个月	1938 年 2 月 16 日
宏文日语学校	邱肃	琉璃寺 18 号	1 年	1937 年 12 月 10 日
竞成女子职业学校附设日语班	舒麟泰	南锣鼓巷 111 号	3 个月	1938 年 3 月 1 日
日语专修馆	汪和沈	棉花胡同 14 号	3 个月	1938 年 3 月 15 日
北京日语学校	庐川骏逸	分司厅胡同 26 号	4 个月	1938 年 4 月 1 日
亚洲黎明	边见天涯	北池子 31 号	6 个月	1937 年 11 月 10 日
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东城日语学校	山室三良	王府井大街 9 号	4 个月(初级 中级) 6 个月(短期师范科)	1938 年 3 月 6 日
西城日语学校	山室三良	小将坊胡同 18 号	4 个月	1938 年 3 月 6 日
北城日语学校	山室三良	黄化门大街 4 号	4 个月	1938 年 3 月 6 日
北京日语专科学校	赵庆棠	三座门大街 19 号	3 个月	1937 年 10 月 20 日
业余日文讲习所	张文耀	兴平巷 6 号	9 个月(初、中、高各 3 个月)	1933 年 11 月 1 日
天理日语讲习所	李相	长卷头条 25 号	不定	1937 年 10 月 25 日
高野山日华学校	高田隆心	三里河 57 号	4 个月(初) 6 个月(中) 8 个月(高)	1938 年 1 月 5 日
商业日语学校	龙九锡	北孝顺胡同 10 号	4 个月	1937 年 9 月 16 日

新华日语学校	宋毅仁	布巷子甲 10 号	3 个月	1937 年 4 月 2 日
竞成补习日语学校	项镜郡	柳树井大街 21 号	4 个月	1938 年 4 月 27 日
簿记日语补习学校	韩汝庚	棉花上七条 7 号	3 个月	1937 年 10 月 20 日
当业日语传习所	杜善奇	西柳树井大街 59 号	6 个月	1937 年 12 月 1 日
乔治日语补习学校	李善承	香炉营头条 59 号	3 年	1938 年 3 月 1 日
黎明语学校第二院	边见勇彦	梁家园甲 1 号	5 个月(初) 4 个月(中) 3 个月(高)	1937 年 8 月 1 日
外城妇女宣抚班附属日语学校	中岛女士	后孙公园 7 号	6 个月	1937 年 10 月 15 日
北京区本部附属日语学校	铃木隆宪	法源寺后街 2 号	6 个月	1938 年 3 月 16 日
新光日语学校	孔宪武	顺城街 60 号	3 个月	1938 年 4 月
业勤日语补习学校	传振铨	棉花上七条 4 号	6 个月	1938 年 3 月
盲人外国语学校附设日语班	杨柴之	沙滩 1 号	3 个月	1937 年 10 月
育材补习学校	王钺	西四北大街 64 号	6 个月	1932 年 8 月 10 日
北京觉生女子中学附设觉生日语学校	幽灵寺善尊	西城阁庚胡同 24 号	3 个月	1939 年 2 月 1 日

从表中可见,北平沦陷时名目繁多的日语学校绝大多数都是沦陷后设立的。其学习期限短则 3 个月,长则 2 年,以 3 到 6 个月的居多。可见其多是以速成为目的的,有着极强的适应日本统治之需的色彩。当然也有实际的经济利益驱动。

日伪在华北沦陷区推行的日语教育,除受其辖区“治安”状况

影响外,还受日语教师有限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华北沦陷区的日语教育推行程度也是高低不同。城市与地方差异很大,以河北省保定道地区为例。根据兴亚院华北联络部1940年3月所作调查,保定道地区的日语教育可分为四等,即:第一等是有充足的日本人日语教师和日语学校的县市;第二等是华人日语教师或县里的翻译教日语的县;第三等是日军警备队到学校教日语的县;第四等是根本没教日语的县。清苑县(今保定市)和石门市(今石家庄市)属于第一等。这两地因其交通便利和重要的地理位置,文化较为发达,日本居留民较多,许多学校可聘请日本人教日语。中国人日语教师中留日或在伪满学过日语的人较多。定兴、徐水、望都、定州等铁路沿线的10个县属于第二等,都是学过3—6个月日语的教师或伪县公署的翻译教日语。靠近铁路日伪统治比较稳定的新城、安平、高阳等9县属于第三等,这些县没有专门的日语教师,日军警备队人员抽空授课,缺课是常事。离铁路较远、日伪难于控制的县属于第四等。这样的县在保定道地区占半数左右。<sup>①</sup>日伪统治区大都在铁路沿线及其附近地区,因此保定道地区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华北沦陷区,日语终归是作为外语课来上的,这与伪满把日语定为必修的“国语”课<sup>②</sup>不同。同时,华北沦陷区的日语教育从小学开始,而汪伪国民政府统治的华中沦陷区,以日本的小学无外语教育为由,规定小学不设日语课,删除了之前伪维新政府在华中沦陷区小学即开日语课的规定。<sup>③</sup>日本在伪满、华北、华中沦陷区

① 同前,兴亚院·大东亚省:《调查月报》第6卷,第218—219页。

②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科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371页。

③ [日]徐敏民:《战前中国的日语教育——在台湾、满洲、大陆的展开与变化之考察比较——》,エムテイ出版,1996年,第267页。

推行日语教育的这种不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对这三地傀儡政权控制程度的差异。

### 三

为消除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抗日思想,日本在华北沦陷区学校除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外,还特别注意从思想上控制沦陷区学生。如前所述,日本人督学官在教授日语的同时,还担负着监督教师及学生思想动向的任务,而且后者更是其工作的中心。有资料显示,在青岛特别市,还实施指导官制度,即向市内公立中小学派遣日本人辅佐校长,以思想工作为中心指导一般校务。从1939年秋开始,又开始向私立中学派遣日本人教师。1940年6月开始进一步扩大指导官制度。被派来的日本人教官还可兼任私立或乡区学校的指导教官,更加强化的对各种学校的思想控制。<sup>①</sup>这种指导官与前述督学官担负着同样的任务。

另外,日伪新民会也插手学校教育,特别注重“转化”学生的思想。早在1938年3月,日伪北京新民会即拟定题目,通知各校转令学生作论文比赛,在拟定的16个题目中,提倡封建复古思想的就有5个,约占了1/3。有关“新民思想”的有3个。“中日亲善之意义”、“中日同文同种之史实”、“说国共两党之祸国”都被拟定为论文题目<sup>②</sup>,其用意显而易见。同年夏季,日伪北京新民会又组织“首都”指导部暑期青年团,设团长1人、团附1人、教官6人、主任

① [日]古川原:《青岛特别市的日语教育》,《日本语》第1卷第3号,1941年6月第35—37页。

② 北京市档案馆编:《日伪北京新民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118—119页。

2人、训导员1人、事务员1人,从7月5日至8月4日对青年学生进行为期1个月的思想集训。95名学员都是日伪从北京各大学、高中的一年级学生中选出的。新民会强调青年团以“启发青年正确思想、造就新民青年为宗旨”。实质上就是拟“先于青年着手”,而“纠正万民思想”,以使沦陷区人民作甘心服从日本殖民统治的“顺民”。讲授的课目除训育、新民主主义浅说、青年身心修养、今后学生运动、国际大势外,共产党批评与国民党批评都分别作为独立的课目来讲。<sup>①</sup>足见其目的所在。

日伪北京新民会在1938年11月开始组织实施的“反共救国周”活动,除伪市属机关外,也把伪北京市立、私立、中学、小学、幼儿园、新民学校及各种社会教育机关列入实施范围。每天除安排30分钟到1个小时的专人演讲外,还粘贴标语、散布传单漫画、出售反共花饰、征集反共剧本、徽章图案、举行中小学生对共“救国”演说竞赛、作反共论文习字等,无所不用其极。<sup>②</sup>

尽管如此,1939年初,北平市内各学校学生仍一般遵奉三民主义,十分讨厌新民主主义;学校当局也阳奉阴违,对伪政权的新教育方针取排斥政策。<sup>③</sup>因此,1939年7月12日至8月12日,日伪北京新民会,又从北平各大专院校、中学等召集182名学生组成北京暑期青年训练团,对学生进行集训。主要讲授国际国内时事和反共理论,以消除多数学生的反日思想,并使中间分子转向亲日。<sup>④</sup>由于汪精卫已公开降日,正与日本及傀儡各方讨价还价,筹划成立伪“国民政府”,为保其面子,华北伪临时政府调整了其教育

① 《日伪北京新民会》,第69—71页。

② 《日伪北京新民会》,第197—200页。

③ [日]《关于北京教育界的教育宗旨及学生状况之件》,《各国教育制度及状况关系杂件 中国之部》第3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④ [日]《北京暑期青年训练团实施报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

方针,新民会也不再提反对国民党。与1938年的青年训练团相比,取消了“国民党批评”等课目。

参加训练团的学生,有的是本来就对新民会反感,可是被学校指名而不得不参加;有的是回不了家为节省生活费而参加的;有的是对训练团抱有好奇心而参加的;也有的以为参加了训练团以后容易找到工作而参加的。<sup>①</sup>除24名大学生及专业学校学生外,其余都是高中生和师范生。<sup>②</sup>集训一开始,主办者即向学生申明,训练团不是在日本人领导之下举办的,参加本团,既不是与抗日分子接触,也不是与亲日分子接触。<sup>③</sup>企图赋予训练团以中性色彩,消除青年学生的戒心。但是,实际讲授的与日本的宣传如出一辙。例如7月15日,北京市立第四中学校长济梅阁来训练团作特别讲演,题目是《建设东亚新秩序》,内容与他在伪中央电台的讲演完全一样,以致受训的学生多数认为:“他把该讲演内容背下来,在学校、集会、电台、报纸上重复讲,这样的讲话不值得听”,更有学生称他为大汉奸。<sup>④</sup>在训练班上,新民会的人大讲“建设东亚新秩序是世界新秩序的出发点”,说什么兴华与兴亚不可分,兴亚不限于日华两国,而是以解放东方各被压迫民族为目的。<sup>⑤</sup>这与日本的宣传完全一致,目的再明白不过:企图消除中国学生对日本侵华的仇恨、泯灭其民族意识,顺应日本的殖民统治。训练团团长曾直言:“我们要去除狭隘的国家与民族观念并超越它,以推进将来的东亚

① [日]杉山部队参谋部第二课:《北京学生思想状况之一斑》,1939年9月2日,第3—4页,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

② 《北京学生思想状况之一斑》,第1页。

③ 《北京学生思想状况之一斑》,第1、2页。

④ 《北京学生思想状况之一斑》,第3页。

⑤ 《北京学生思想状况之一斑》,第3—5页。

建设。”<sup>①</sup>教官也诱导学生取“纯真积极主义”，积极顺应日本的殖民统治。<sup>②</sup>日军宪兵、新民会部长缪斌、伪临时政府教育部长汤尔和等都给受训学生训话，足见日伪对控制学生的思想是如何重视，使沦陷区学生思想“转向”成了日伪在华北沦陷区实施教育的重点。

日伪是否能由此转变沦陷区学生的思想呢？我们来看一下训练团学生对日伪军政要人训话的反应。听了日军宪兵的讲演，受训学生认为，不能离开自己的立场来谈日华问题；日本的目的如果在扑灭共产思想，那么还是乘苏“满”国境事件进攻莫斯科为好；不赞成以日本人为中心建设东亚新秩序及大和世界的理论；日本如果说民族解放，那么就应自己先解放朝鲜、台湾；反共彼此只是口头理论，实际上，日本、德意都没从根本上反共，英法与苏联缔结协定不是由于苏联与德意接近促成的吗？<sup>③</sup>日本大阪商业大学的学生主事竹山增次郎带领日本学生勤劳报国队来华，也在该训练团讲演，称日本的目的在于建设东亚新秩序而非侵略中国；日华提携是历史的必然，英国援蒋是利己等。学生听后，认为现在日军的行动有的方面并不象竹山所说；如果说是为反共及驱逐欧美势力的圣战的话，现么是否可以乘苏“满”国境战事进攻苏联、日英会谈马上决裂、明确取进攻姿态？<sup>④</sup>更有受训学生问训练班的负责人：“团长又聪明又有才学，干什么也能生活，为何不去南方（南下抗日之暗语——引者注）而留在北方为新民会干事？不明白团长的打算。”这名团长解释了自己的所谓抱负与立场，该学生认为是答非

① 《北京学生思想状况之一斑》，第3页。

② 《北京学生思想状况之一斑》，第6页。

③ 《北京学生思想状况之一斑》，第9—10页。

④ 《北京学生思想状况之一斑》，第11页。

所问。<sup>①</sup> 受训的 182 名学生中约有 30 人亲日, 仅占 16%, 他们在训练班中受到其他学生的压迫和殴打。<sup>②</sup> 由此可见, 在日本全面侵华的大背景和残酷的现实面前, 任何“中日提携”、“兴华”等说教都无法改变大多数中国学生的抗日决心, 只能强化而不能泯灭中国人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日伪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对学生进行集训后, 学生中仍普遍存在着特别旺盛的民族意识, 亲日即是汉奸的认识在学校相当浓厚。<sup>③</sup>

事实正是如此。北平的学校师生在日伪的高压之下, 仍然保持着“五四”青年的革命精神。他们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 学校中的日籍学生成了众矢之的; 北平学生不愿意穿伪市政府规定的制服; 有些学生还打电话大骂伪校长、教导主任等。沦陷区学校的师生, 为了要牢记自己祖国的文化、历史, 努力学习祖国的语言和文字, 经常是用两套课本, 当日本宪兵、汉奸不在场时就读中文课本。<sup>④</sup> 以抵制日伪对学生思想的控制。

综上所述, 日伪在华北沦陷区, 以所谓新民主主义取代三民主义, 推崇封建思想, 更改课程设置, 修改教科书, 向学校派遣日本人监督官, 教授日语的同时, 监视并控制学校师生的思想动向, 推行奴化教育政策。一为其实际统治之便利, 二为强制推行日本文化及思想, 日伪大力推广日语教育, 设日语为中小学必修课。同时, 社会上名目繁多的日语学校的出现, 成为华北沦陷区教育界的一种畸形现象。为从“学生”着手转变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思想, 日伪特别注重控制学生思想, 利用各种宣传手段, 查禁各种进步书刊,

① 《北京学生思想状况之一斑》, 第 14 页。

② 《北京学生思想状况之一斑》, 第 16 页。

③ 《北京暑期青年训练团实施报告》。

④ 《中国现代教育史》, 第 374—375 页。

还举办各种训练班,力图使学生思想“转向”。但结果证明,华北沦陷区的绝大多数学生仍保持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抗日思想,任何说教和宣传都无法改变日本侵华、掠华之铁的事实对青年学生思想的影响。

(作者:王士花,196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 兵)

## 《三百万日俘日侨遣返实录》

2004年7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由梅桑榆编著的《三百万日俘日侨遣返实录》,24万字。该书记述了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侵华日军和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在遣返回国过程中发生的焚毁军营、藏匿军火、杀人强奸;战俘集体自杀、越狱逃亡;千万女日侨突击寻夫;遣送船海上爆炸等史实,披露了三百万日俘日侨从集中营到遣返的各种内幕。